

增订中国史学史

四

谢保成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謝保成、著

增訂中國史學史

四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二〇一六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增订中国史学史：全四册 / 谢保成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

ISBN 978 - 7 - 100 - 12571 - 0

I. ①增… II. ①谢… III. ①史学史—中国 IV.
①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5438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增订中国史学史

(全四册)

谢保成 著



商务印书馆 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9)

商务印书馆 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2571 - 0

2016年10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69 3/4

定价：198.00 元

第四册目录

社会格局屡变，史学不断更新（晚清至民国）/ 1509

第十二编 “增其新而不变旧”的晚清史学

第一章 由盛转衰引起的思想震荡 / 1514

第二章 史学格局的变革 / 1529

第十三编 “新史学”的兴起与变异

第一章 “新史学”兴起 / 1579

第二章 近代考古学传入与本土文化遗存
被发见 / 1618

第三章 “国学”与“国粹”、“国故”的
两次论辩及差异 / 1638

第四章 打破上古史系统的“古史辨” / 1667

第五章 “寻伪之所出，通类例所在”的
“古史新证” / 1698

第六章 流派纷呈的史学论与史学方法论 / 1727

第七章 旧体史书编纂 / 1769

第八章 新体史书涌现 / 1809

第十四编 史学更新的新路向

- 第一章 社会史论战及其对史学的影响 / 1855
- 第二章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就与功绩 / 1897
- 第三章 上古、中古史研究 / 1932
- 第四章 几种“历史哲学”与历史观 / 1974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史学骨干队伍与基本框架 / 2012
- 第六章 史书撰著与史料整理研究 / 2054

附 录

- 三大系列史书成书时间表 / 2122
- 二十六史篇卷及表、志、类传篇目表 / 2130
- 基本史书书目（300种）/ 2145

后 记 / 2159

一校校后记 / 2169

补 记 / 2171

社会格局屡变，
史学不断更新

（晚清至民国）



道光中期以后，文明古国第一次受到先进社会制度、先进生产力的猛烈冲击。为挽救危亡，探寻救弊之道，“以史经世”再起，推动史学逐渐向社会变革靠拢，开始改变传统史学格局。放眼世界，喊出“史界革命”口号，提出“新史学”理论，预示着中国史学即将面临不断更新、不断出新、不断创新的巨大变革。

20 世纪前半纪的史学进程明显地表现为前后衔接的两个阶段，以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为分界线。

伴随着世纪初“新史学”的兴起，近代考古学成为“新史学”必不可少的内容。史前遗址（包括直立人化石、旧石器时代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拓展了史家眼界，改变着对史学的传统认识。新材料的发现与整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史研究的路向。国外思想学说和学术方法，运用于新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存上，使得中国史学呈现出更新的态势。

新思想、新史料大量涌现，引起旧思想、旧史学的激烈反对，出现“国粹”、“国学”与“国故”之争和关于古史的长期论辩。历史考据学从理论到方法都得到一次提升，成为辨识后人如何“层累”古史、“逐层增建”古史的一种思想观念。以“二重证据法”进行古史新证，成为揭露史书中某些主体意识“有所缘饰”的重要方法。

此间新旧体史书编著并驾齐驱，恰好反映此时的史学依然新旧杂陈的状况。

1927年、1929年，王国维、梁启超先后谢世，标志着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谢幕。他二人所代表的“新史学”两大基本路向，以更新的方式取得长足发展，影响着此后的史学进程。

王国维所代表的路向，以史学与新史料相结合，历史语言研究所集中体现了这一路向的实际，推动着中国史的基础研究向纵深发展。梁启超所代表的路向，以史学与现实紧密结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一路向的实际，推动着中国史学观念的转变、部分分支学科的形成。经过整整20年的努力，历史语言研究所将掌握在洋人手中的诸多话语权逐渐夺了回来，证明“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构筑起区别于其他史学的基本框架，预示着中国主流史学的新趋势。

与两大主干同时并存，偏重史学与史料关系者，成就卓著，影响久远。偏重历史哲学者，以各种“文化”或“生命”观念，试图“另谋开辟一条新途径”，但没有真正深入地研究过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因而“是玄学的，非科学的”。

20年间的史书编著层出，既有作为某“潮”某“派”的代表作，更有数量可观而不属于某“潮”某“派”的撰著在学术领域有着无可比拟、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在中外不断碰撞下，中外关系史、世界史研究的兴起，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人认识世界所迈出的步履。

第十二编

『增其新而不变旧』的晚清史学

增订中国史学史

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者硬要轰开东方古国紧闭的大门。极不情愿打开国门的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在洋枪洋炮面前，由“闭关锁国”转而为“开门揖盗”。这是一次比200年前明清交替更加深刻的“天崩地解”，社会开始急剧变革。自此，中国进入一个剧变的时代。史学随着社会变革发生剧烈变革，一次次被更新，形成新与旧、中与外的错综复杂的交织与碰撞。就总体情况而言，晚清史学发展的基本态势是“增其新而不变旧”。

第一章 由盛转衰引起的思想震荡

清朝统治至乾隆中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史称：“高宗登极，所布诏令、善政络绎，海宇睹闻，莫不舞蹈。”^①“纯皇帝即位时，承宪皇严肃之后，皆有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屡下，万民欢悦，颂声如雷。”当时，江南民谣称：“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②

被“盛世”光环笼罩的人，沾沾于“盛世”的种种“功绩”，日渐昏昏然。当“盛世”一过，人们立即发现，曾经“辉煌”过的年代

① 《郎潜纪闻二笔》卷2。

② 《啸亭杂录》卷1《纯皇初政》。

却潜伏着种种社会危机，但已追悔莫及，所谓再造“辉煌”只能是一种愿望而已。

第一节 社会危机，列强紧逼

乾隆中期以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长，国力似乎日趋强盛，整个统治集团志得意满，不可一世，骄奢淫逸、贪婪残暴恶性膨胀。自号“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更是铺张无度，大兴土木。六下江南，各项有名目的花费总数达 2000 多万两白银，差不多占乾隆三十一年（1766）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半，是乾隆元年（1736）国库存银的 2/3。皇上的铺张无度，极大地助长了整个官僚集团的奢侈腐败。各级官吏，竞相逢迎，事事攀比，谄媚争宠，一方面“培育”出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另一方面使民风日渐奢靡，民财日益枯竭。臭名昭著的大贪官和珅能够总揽军机 24 年，就是乾隆皇帝纵贪的一大铁证。乾隆皇帝的军旅之费、土木游观之费，索之于和珅，和珅索之于督抚，督抚索之于州县，州县索之于黎民。在和珅的包庇纵容下，朝野内外，贪污聚敛、营私舞弊之风弥漫，几乎无官不贪，无吏不暴，以致乾隆后期贪污大案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越禁越贪，越贪越大。

乾隆皇帝虽然不情愿放权，依然掌控朝纲，却也在退为太上皇之际表达出一定的忏悔：“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①

当时，外国人又如何看待这个“盛世”呢？乾隆六十年（1795）闰二月，朝鲜使臣在写给其国王的闻见别单中有这样的说法：“阁

^① 《清史稿》卷 357《吴熊光传》。

老和珅权势隆盛，货贿公行，庶官皆有定价。诸皇子皆以为和珅之材货若尽取，则天子亦不足贵。”^①英国公使马戛尔尼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年底游历中国之后，已经清楚地看到“盛世”只不过一个空壳而已：

清帝国好比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 150 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般幸运的、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它胜过其邻船的地方，只是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②

巨贪伴随“盛世”，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以史为鉴”，这应该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人们似乎习惯将“乾隆”这个年号与“盛世”画等号，但不要忘记将“乾隆”这个年号与“巨贪”也画一个大大的等号。

巨贪伴随“盛世”，“盛世”埋下社会危机，而且是积重难返的危机。嘉庆皇帝尽管经历了“盛世”，却也看到“盛世”之下潜伏的危机，即位之初便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力图避免衰败过早到来，以期延续“盛世”局面。然而，“盛世”不再，“辉煌”难造。

整个官僚集团的贪婪腐败，社会上下的奢靡风行，成为难以逆转的“人祸”。乾隆后期，在全社会贪婪地掠夺社会财富的恶劣环境下，各项水利工程与河流治理工程成为各级官吏的生财之道。水利年久失修，水旱灾害必然由少增多。山东地区，早在乾隆十一年（1746）胶东大水，许多人家破人亡。潍县平均十天卖一男孩，五

①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 11 册，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4891 页。

② 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日卖一妇女，道路两侧尽是被遗弃的男婴。京畿地区，虽然地处天子脚下，同样是“一遇凶年，支绌立见”^①。嘉庆六年（1801）初，京师大雨连绵，永定河水涨发，直隶所属各州县民田、庐舍多半被淹。皇帝再三下谕旨赈济灾民，但各级官吏阳奉阴违，乘机中饱私囊，各地饥民能领赈者不过十之三四，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者往往转死沟壑。嘉庆十八年（1813）上半年，京畿、直隶不少县份发生旱灾，每亩地产粮不过一二斗，地方官吏趁机巧立名目，进行勒索，“又出派差，民力甚是拮据”^②。

“人祸”酿天灾，造成赤地千里，流民遍野，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走投无路的贫苦民众，经过秘密结社，最终走上武装自救的道路，这是广大贫苦民众当时可能自救的唯一选择。白莲教在各地社会下层发展，形成许多支派，以各种不同形式发动武装起义。乾隆三十九年（1774）清水教头目王伦在山东寿张、堂邑一带发动起义，虽然很快被镇压，却成为此后一系列武装起义的前奏，成为清朝统治开始走下坡路的重要信号。自乾隆晚年至道光前期，武装起义此起彼伏，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嘉庆元年（1796）川陕红阳教起义、嘉庆十八年（1813）京畿与直鲁豫天理教起义、道光十五年（1835）山西赵城先天教起义。

在潜伏的种种危机汇聚为“内忧”的同时，整个“大清帝国”更面临着从未经历过的“外患”的威胁。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内忧外患”的情况，中原皇朝被外族推翻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但19世纪中叶出现的“内忧外患”与以往情状决然不同。先前都是生产力较为落后的边族入主，为确保其统治的稳固，必然无条件地接受中原较为先进的生产力与思想文化。因

① 光绪《顺天府志》卷31。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署步军统领英和奏折。

而，入主中原以后的新皇朝统治者也总是以“老大”自居。清朝统治者也不例外，入主中原之后，同样以“天朝”自居。殊不知，此时的世界已不再是昔日的世界，在亚洲大陆尚属先进的生产力与思想文化，在全世界已经不再先进了。

正当乾隆沾沾于“盛世”之时，英国已经开始扭转乾坤的产业革命，手工工业逐渐被机器工业取代，生产力迅猛发展。而嘉庆“咸与维新”之际，蒸汽机已开始在欧洲广泛应用于工业各个领域。1819年第一艘蒸气轮船下水，使英国海上交通出现巨大变革，迅速影响到全世界，一下子缩短了东西方的距离。“资本”的“贪婪”本性注定西方列强不仅利用先进的运输工具把堆积如山的工业产品销往世界各地，还必然要依仗先进的炮舰加紧对世界各地的侵占与掠夺，地大物博、文明富庶的亚洲大国自然成为其蚕食的最佳目标。

习惯以“天朝”自居的华夏子孙，此时对于世界形势一无所知，依然陶醉于“天朝上国”的幻象之中。嘉庆过后，道光皇帝继位，依然是“九卿无一人陈时事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①。各级官吏所干之事，是如何搜刮、聚敛和安享富贵尊荣，哪里管民间疾苦、国家安危。文治腐败，武备更是不堪一击。军官不理营务，只知一味克扣粮饷；兵卒从不操练，就连守卫京师的八旗也是“三五成群，手提鸟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②。1834年，两艘英国舰艇闯入虎门，在内河横冲直撞。道光皇帝闻报大怒：“看来各地炮台俱系虚设，两只夷船不能击退，可笑可恨！战备废弛，一至于此，无怪外夷轻视也！”^③

面对如此情状，清朝最高统治集团以无可奈何的心态继续着传统的闭关锁国政策，作为防范西方列强的简单手段，试图以此对付列

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应诏陈言疏》。

② 黄爵滋：《敬陈六事疏》，《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疏合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7页。

③ 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30页。

强的侵扰，达到拒之国门之外的目的。然而，此时的列强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周边不发达政权，“资本”决定其不择手段地进行掠夺，不是闭关自守能够拒绝得了的！更何况，自18世纪初至19世纪20年代的百余年间，经欧洲商人输入中国的白银至少有5亿元之多。如此巨额的白银流入中国，出现巨大的贸易逆差，西方列强如何能够甘心！于是，不惜以杀人毒品——鸦片作为“特殊商品”，偷偷输入中国。清朝的闭关锁国之策，锁住的仅仅是民间贸易，却丝毫没有锁住鸦片的输入：“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①英国的鸦片贩子，不惜重金收买清朝各级官吏，勾结中国烟贩，建立遍及内地的贩毒网点，不少地方官吏成为贩毒的耳目与帮凶。地处长江中下游的两湖、江西，“为烟土出入之门户，其大伙烟贩，动辄百十成群，犹如私梟之出没，器械森然，人视死如归”^②，强行通关，无人敢拦阻。至鸦片战争前夕，鸦片的销售总量已达35500箱，总价值2000万元，大大超过当时茶丝出口总值，扭转了英国对华贸易的逆差。

道光皇帝虽然明白“此物不禁绝，使流行于内地，不但亡家，实可亡国”^③的道理，也派出湖广总督林则徐为禁烟钦差大臣，并有“虎门销烟”的壮举，然而腐朽的国门一旦被洋枪洋炮轰开，什么“天朝上国”的威严，什么“闭关锁国”的祖训，都只能是驯服国民的工具，却无可奈何于列强。最终，极不情愿地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开启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屈辱时代。

腥风血雨中夹带着近代文明，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

① 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端片》，《鸦片战争》（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141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66页。

③ 雷瑯辑：《蓉城闲话》三，《鸦片战争》（一），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314页。

第二节 思想领域的新变化

在新的“天崩地解”出现之际，习惯于向传统讨教的思维方式，使人们又一次举起明清之际曾经打出过的“经世致用”的旗帜，力图挽救垂危的统治秩序。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一批仁人志士，开始向传统的思想认识发起最早的冲击。

一、敢劝“天公”降人才

早在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的一首七言诗奏响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乐章的序曲：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龚自珍（1792—1841），又名巩祚，字瑟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人（今属杭州）人。段玉裁外孙，自幼承家学渊源，研讨经史、诸子、文字音韵、金石之学。道光进士，历官礼部主事。面对清朝统治的腐朽，龚自珍察觉到社会的潜在危机：“六十载太平之盛，人心惯于奢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其尤甚者。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①“慷慨论天下事”，表示出“良史之忧忧天下”的志向。

为扫除学术界“万马齐喑”沉闷气氛，龚自珍写下《明良论》、

① 《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6页。